

漫游费为何最终未能令人完全满意

■今日视点

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3日公布:3月1日起实行手机漫游费上限标准新方案,即主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6元,被叫上限标准降为每分钟0.4元。占用国内长途电路不再另行加收国内长途通话费。

(2月13日《新华社》)新浪网在新闻背后做的一个小调查中,有88%的网友对最终的降价方案还是很失望,认为漫游费还是太贵了。而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要兼顾消费者利益和电信事业发展需要”的表态,也基本上决定了最终方案的降幅不会有消费者期待的那么大。可以说,漫游费最终降价方案与民意尚有较大差距。人们对最终确定

的方案诸多不满,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民意始终“漫游”在公共决策之外,无法形成具有强制效应的制度安排,对各种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走向无从置喙时,包括听证会在内的保障举措就成为徒具观赏性的形式花架。

我们经常说,民意所向应当成为国计民生决策的首要参照。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民意虽然代表了十多亿人的共同愿望,但如果缺乏稳定而可行的制度设计,就无法通过公共渠道凝聚起来,转化为可与强势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平等博弈的力量,无法在各种政策变动的谈判平台上,公开表达不同立场,并且让这种立场导入公共议程,影响政策走势,最终获得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博弈结果——弱者获得足够

补偿,利益得以均衡分担。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表达了对听证会的不满与担忧。这正是因为作为民意诉求的第一步,听证会在听证代表资格获取、听证方案信息披露细致到位、听证过程公开透明、听证结果接受民众检验等环节中,如果能按照一整套获得民众广泛认可的程序正义逐步推进,民意就能处处体现于听证体系之中,听证结果就不会偏离民意方向而落入幕后交易陷阱,民众权益也不致成为利益集团满足私欲的牺牲品。而现实与公众期待恰恰相反——听证代表不经选而内部圈定,听证方案总是云里雾里,听证过程秘而不宣,听证结果大多与民意背道而驰……

听证会所面临的尴尬,是民众在现行公共决策框架内

保障缺失的真实缩影。民意不能畅通抵达决策中枢,民权虽有宪法规定但无从落地,民心与政府意愿长期处于分离状态,造成了不少政策始终无法做到“开门决策”,实际运行与民众承受力严重脱节的后果。

如果民意始终“漫游”在公共决策之外,就会造成公共决策过度政治化、部门利益资源公平分配,形成对民众或弱者适当倾斜照顾的帕累托改善,反而助推了资源流向的两极分化,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公共管理者须臾不可忘记,公共决策归根结底是权利分配问题,必须通过完善的民意获取程序、对职能部门与利益集团的权力制衡,才能维护政策的正当性与大众性。

(毕舸)

灾后重建 勿忘重塑避险意识

■公民发言

遭遇雨雪冰冻袭击的南方地区终于迎来了鼠年的阳光,冰雪开始消融,灾情明显缓解,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成为灾区近期工作重点。

(《新华社》2月13日)灾难中我们感动于政府与民众的齐心协力,我相信,有同样的精神是不难取得灾后重建新成就的,但除了物质上的重建外,更重要的还是重塑人们的防灾意识,让人们能更理性地防范各种可能的灾害,从而更积极主动地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中。

一场飞雪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它也不得不使我反问自己,假如三天停电停气、十天交通运输中断,我的生活将会如何?仔细考察一下,我发现我第一天将会没有开水喝,第二天没有粮食吃,第十天到来时我将失去保护妻子的能力,这就是我承平日久后对于灾难的应变能力。发生在其他地区的灾难,也从一定角度提醒我们应该确立必要的避险意识。当灾难降临时,我们如果拥有必要的自救能力,本身减轻对于政府的依靠,同时也防止灾难发生时过多争夺过少资源,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关心。

其实只要平常做一些准备,生活将不会那么艰难,灾难的面目也不会那么狰狞,比如只要有几百斤煤,几百斤米,冰冻雪灾只会增加人们的生活经历,并不会形成过多恐慌。灾难发生时,有很多人指责着政府应急反应机制某些方面的不完善,而我认为更不完善的是我们的避险意识,很多人离开了政府就失去了起码的自我保护能力。

这场灾难检验了人们的生存能力,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交了一个不合格的答案,但更可怕的是,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避险意识,仍然将避灾作为他人或者政府的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和平安逸的生活使得他们相信灾难即使发生,也不需要自身作出更多的努力,不愿意在平时多留意一点,忘却了自己应该的避险责任。

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我们无法拒绝灾难的到访,我们只有积极准备,才能保护自身的生活,自身的可持续应变,才能使得整个社会面对灾难进退有据。

(邹云翔)

现在说“防止房价过快下降”太早了

■热点纵论

近日,建设部副部长姜伟新表示,将采取三大措施,在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同时,把帮助中等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大胆探索如经济适用房等新途径。姜伟新表示,总的原则是既要防止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也要防止过快过猛下降。

(2月13日《上海证券报》)防止房价过快上涨,这既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民心所向;防止房价过快过猛下降,从长远来讲,也是国家金融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等的需要。但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谈论防止房价大降是不是为时过早呢?

目前的一个现实是,房价仍然上涨过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4%,环比上涨0.3%。从涨幅来看,自从2003年全国性房价上涨以来,在很多城市,房价几乎

都已经成倍上涨。如在不少城市,2003年以前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的房子,现在不少都已经卖到了7000元—8000元,有的甚至卖到了万元以上。

另一个现实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近期来房价出现了所谓的“拐点”之说。如上海、广州、深圳等房价涨幅过快的一线城市,交易量急剧萎缩;一些一线城市的楼盘吹响打折集结号的消息——不少楼盘都在打折,送东西、车位、物业费、全装修……一时间,楼市仿佛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领涨之地的房地产中介见人地涌起一股“关店潮”。

一方面是房价上涨过快,一方面是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拐点”现象。可以说,这既是国家调控房价措施刚刚得力的表征,也是老百姓渴望已久的愿望。而且从老百姓的角度,刚刚出现的所谓“拐点”,还不能够令他们满意:房价依然很高,而

且整体上依然在不断攀升。

而且,所谓的房价出现了“拐点”,是不是真的就是“拐点”,就很值得怀疑。一是目前各地房价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相反,还是在持续不断上涨。二是“拐点”只是一些房产商们的营销策略。房产商们深知目前老百姓等待房价下降的心态,有些房产商就用“拐点”的概念来忽悠人,先升后降,明降暗涨。正如有评论所说:“拐点”只不过是房产商面对宏观调控的“集体做戏”——假摔而已。

在房价依然上涨的时候,在调控房价依然任重道远的情况下,现在谈论防止房价大降,是不是早了点呢?作为政府部门,调控房价应该是个持久战,不能因为所谓的“拐点”现象的出现,就担心房价过快过猛下降。如果政府部门现在真的担心房价过快过猛下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也许就正中那些房产商们的“圈套”了。(徐经胜)

应从美国“救生索计划”中悟到啥

■相关评论

为避免房贷违约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和六大房贷商12日提出一项“救生索计划”,以帮助那些因还不起房贷而即将失去房屋的房主。

(2月13日《新华网》)那么,“救生索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根据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当天披露的计划,拖欠房贷逾期90天或以上的房主可以和房贷商取得联系,如果房主符合一定的条件,他们将有机会获得30天的缓冲期,其房子可以暂时中止被拍卖,房贷商将在此期间制定让房主们更易负担的还贷方案。六大房贷商都是谁呢?参与该计划的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六家房贷公司几乎占了美国房贷市场的50%。都涵盖哪些房屋贷款呢?与此前只针对次级贷款市场的援助行为不同,这次的“救生索计划”涵盖所有类型的房屋贷款。

可见,这次“救生索计划”覆盖的房贷市场、房贷

种类、房贷公司分量之重、之广、之全是前所未有的。这件事令人不得不深刻思考,标榜为完全市场化体制的美国,对于房主还不起贷款,竟然没有采取拍卖房子、扫地出门的措施,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使房贷公司让步、让利,使房主们能够保住房子,避免流落街头。原因何在?

实际上美国政府无非是算了两笔账。一笔经济账,一笔是政治账。根据一些业内人士的估计,全美今年有100多万房主无法按期归还房贷,他们正面临房屋被没收拍卖的命运。在前几年美国房市火热时,许多信用不高的美国人靠借利率高的次级贷款购房。但随着房市泡沫的破裂,房屋价值大为缩水,许多人无法按期还贷,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如果处理不好这100多万房主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采取简单的扫地出门、拍卖房子的措施,那将使次贷危机影响面越来越深,也许真的会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泥潭。同时,把100多万家庭扫地出门,这不但是个经济

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美国实施“救生索计划”的真正目的在于:为避免房贷违约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呢?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特别是泡沫巨大的高房价往往是引发社会、经济出现问题的导火索;任何国家对于住房都不能采取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对于造成大面积房主还贷困难,那就不仅仅是房主个人问题,而要从整个住房市场、房贷市场是否健康进行思考;住房市场的畸形发展最终都是受害者:国家、房贷公司、房主。高房价一旦出现,没有赢家。

因此,结合中国内地住房市场情况来看,必须汲取美国的教训,决不能让房价高到不可收拾时再采取措施,那时就晚了。因此,下决心把高房价这个社会、经济的总祸害降服,不能有半点的犹豫和动摇,否则,最终还必须由政府来收拾残局,最终受害的是百姓以及企业。(付瑞雪)

换二代证为何不能异地办理

■热点纵论

新年伊始,“从今年起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将全部停止使用”的网络传言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高度关注。针对这一传言,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安琳表示,公安部计划到2008年底完成8亿人口的集中换发身份证任务,在全国集中换发任务基本完成后,国家将适时做出停用一代证的决定,但目前我国一代身份证何时停用尚无具体时间,网上传言不实。安琳同时提醒,居民应尽快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二代证。

(2月13日《大河报》)安琳的表态肯定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们的疑虑,但由于身份所限,他的声音依然显得不够权威,依然不能尽释人们心中的疑惑和焦虑,这个时候,公安部应该尽快出面对网上的传言作出回应,让更权威的声音彻底消除人们的疑虑。及时应对网上传言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最大程度地创造便利条件让人们尽快换领第二代身份证。

“一代证今年起停止使用”的传言之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的焦虑,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尤其是不在户籍所在地的人)依然在使用第一代身份证,还没来得及换领新证。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没来得及换领新证呢?其实并非他们不想换,实在是换领新证对他们来说太麻烦了。正如安琳提醒的那样,

维护治安要警惕“技术崇拜”

■热点纵论

昆明市公安局的部分巡逻民警最近有了“第三只眼”——在大檐帽上装一个摄像头。有关方面称,有了这个“第三只眼”,好处多多:民警将不再为处置治安案件取证难犯愁;可以防止袭警事件的发生;规范了民警行为,保证了案件处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等等。

(2月13日《北京晨报》)一个小小的摄像头就能起到这么大的功效?我对此是有怀疑的。假如一个摄像头真的可以轻易搞定这么多复杂问题,那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一个城市有足够多的摄像头,则大部分警察就变成多余的了——这不是很傻很荒诞吗?

我并不是要否定先进技术装备的作用,而是想强调一点:先进技术并不会自动带来正义。实际上,近年来不断有警察装备先进技术装备的消息见诸报端:比如有的地方采用了“双探头、高保真等”监控手段,声称这样就可以“保障被讯问对象的人权”;有的地方

“居民应尽快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二代证”,也就是说,不管你离开户籍所在地有多远,不管你有何忙,不管你户籍所在地要花费多少金钱和时间,你也得关山万里地去户口所在地才能换领到二代证。在时下的中国,有多少在外谋生的人早已远离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有多少人迫于工作生活压力无暇赶回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换领二代证?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对“一代证已经停用”会产生本能的焦虑。

给8亿人口更换身份证是一件浩繁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公安部门最大努力给换证提供便利条件。为了让那些还没换证的人尽快领取二代证,为今之计,公安部门除了要及时澄清网上的谣言,更要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让“人户分离”者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换领到二代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人户分离”者在离他最近的派出所换领二代证,众所周知,目前的证件信息都是存储在电脑里面的,而发达的网络技术,也让信息可以实现无障碍交换,可以说,让人们像异地取款一样异地换领二代证,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瓶颈。

异地换领二代证,既方便了“人户分离”者,又能尽早实现年底完成8亿人口的集中换发身份证任务,可谓一举多得。现在技术已无障碍,民心期盼甚急,所欠缺的,仅仅是公安部门的一点努力而已。(冬晖)

使用了“公安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宣布如此“干警执法,就没人再敢乱插手”,但结果如何呢?相信每一个关心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结论。况且,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记得昆明轰动一时的警察杜培武杀妻案,就是靠“先进的测谎仪”等技术手段“认定”的,杜差点被枪毙,直到真凶落网,杜培武的冤情才得以昭雪。

要搞好治安,不断提高警察的技术装备水平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这两条:一是刚性的制度建设。要通过健全而完全的制度建设,使警察以及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装备,只能用来维护法律和正义,而不能用来牟取私利。二是软性的警民关系建设,使警察真正成为市民的贴心人,能够时时处处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拥戴,套用一句老话就是:警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对技术崇拜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因为过分强调技术装备的改善而忽视制度建设,是搞好社会治安乃至一切事业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一点,昆明的警方不可不察。(郭松民)

富豪摆阔也可以“利国利民”

■公民发言

大批趁春节假期特意来港“扫货”的内地豪客,越买越豪,有的甚至带了一手提包的人民币访港,三四天豪花20万元买名表、钻戒。

(2月13日《中新社》)内地富豪“摆谱显阔”早已不是新鲜事。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都无法改变奢侈品消费在国内突飞猛进的事实。因此,与其一味批评,不如进行引导:把奢侈品消费引向利国利民的一面。我们当前要做的:一是征收奢侈品消费税;二是变奢侈品消费大国为生产大国。

开征奢侈品消费税,前几年有识之士就多次呼吁,税务部门也流露出开征的意愿,但至今未果。据报道,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达60亿美元(未包括豪华游艇、直升机消

费额),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增长至12%。可以说,开征奢侈品消费税的时机已经成熟。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变奢侈品消费大国为生产大国。目前,主导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是国际品牌,鲜有中国品牌。欧美国家不仅是奢侈品消费大国,更是生产大国。由于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本就由本国生产,整个国民财富并没有减少。我国却相反,奢侈品大多为国外品牌,真金白银都流到国外去了,这对国家财富积累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在当前奢侈品消费量越来越大的今天,一味指责无济于事,而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让富人的消费转化为对国家税收的支持,同时变奢侈品消费大国为生产大国,寻找新的财富增长点,正是理性的选择。(王攀)